

#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处理重大涉外事件的经验与启迪

孙晓晖<sup>1</sup>, 郭文亮<sup>2</sup>

(1. 广东商学院 政治与教育学院, 广州 510320; 2.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征程中,曾遭遇过朝鲜战争、中苏断交、中日靖国神社事件、“炸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等各种重大涉外事件的严峻考验,但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都顺利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得了中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总结来看,党处理重大涉外事件的宝贵经验有:一是审时度势,沉着反应;二是总揽全局,统筹各方;三是独立自主,利益至上;四是依靠人民,广泛动员。由此得出的历史启迪有:一是要学会“刚柔并济”;二是要学会“智勇双全”;三是既要善于引导民族情绪,更要善于控制民族情绪;四是既要善于“化险为夷”,更要善于“转危为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重大涉外事件;经验与启迪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3)02-0125-04

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格局,经历了由两极政治格局向多元力量发展的演变过程,伴随国际力量的不断分化与重组,多种矛盾盘根错节、相互交织,重大涉外事件时有发生。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来自国际上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各种挑战和考验接连不断。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诸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破裂、80年代的中日靖国神社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90年代的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及世纪之交的中美撞机事件等。在军事方面:先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印边境冲突、中越边境冲突等局部战争<sup>[1]</sup>。在经济方面,先后有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等。面对变幻莫测的各种重大涉外事件,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淡定的心态,冷静观察,沉着反应,机智灵活,多谋善断,成功地化解了执政过程中由涉外事件带来的外部风险。

## 一、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涉外事件的个案概述

### 1. 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不久就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武装侵略朝鲜的战争危机。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朝鲜的独立及安全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朝鲜战争的发生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干涉日益威胁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对于初掌执政大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涉外危机。

当时的新中国立足未稳,百废待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困难局面,我们敢不敢出面制止美国的侵朝行为?有没有可能战胜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装备的美国现代化军队?在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策,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既申张了国际正义,又保护了本国的安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地位<sup>[2]</sup>。

收稿日期:2012-12-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动员研究”(09BDJ0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12JJD710115)、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工作及传播的创新研究”(2012ZY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晓晖(1984—),男,山东安丘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危机动员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郭文亮(1953—),男,湖南常宁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党的建设研究。

## 2. 中苏关系破裂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和矛盾冲突逐渐趋于明显。苏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需要缓和同美国的关系, 并力图将中国的外交纳入到其全球战略轨道。1960 年 7 月, 因国家利益分歧, 苏联在一个月时间内单方面撤走了 1 390 名专家, 撕毁了 300 多个合同协议, 废除了 200 多个科技项目。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苏联报刊和广播还大力进行反华宣传, 在其中公然煽动中共党内和国内所谓“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至 1966 年, 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两国关系也随之日益紧张。

在中苏关系日益紧张的 60 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名义, 陆续发表了 9 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在中苏论战中,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一贯以来的“老子党”作风以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做派进行了及时的反击和批驳。在中苏断交、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 中共适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 以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 并在 1969 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不畏强敌, 有力捍卫了领土主权<sup>[3]</sup>。

## 3. 中日靖国神社事件

1985 年 8 月 15 日, 正值抗日战争结束 40 周年纪念日, 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却以国家首相的身份率领内阁成员到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这是二战结束以后, 尤其是在 1978 年日本二战甲级战犯被供奉到靖国神社之后, 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sup>[4]</sup>。

中曾根以首相身份与其他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举动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对。此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同时, 也引发了中日关系的轩然大波。党和政府谴责此举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 予以严正批判。

## 4.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

1999 年 5 月 7 日和 2001 年 4 月 1 日, 先后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入侵南斯拉夫的战争中悍然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和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与中方歼—8 战斗机发生撞机的事件。这两起事件都属于重大涉外事件, 又都与美国有着直接关系。在国内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 两次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突发性极强的重大涉外事件面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假使处理不当, 要么导致国内民情激愤, 引发社会动荡; 要么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甚至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在处理这两起重大涉外事件的过程中, 党中央高瞻远瞩, 在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同时, 快速反应、沉着应对, 迅速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维护国家和人

民的最大利益<sup>[2]</sup>。面对事件带来的严峻考验, 党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大局下行动, 机智应对, 泰然处之, 不为外部所动,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这既保护了中国的主权与利益, 又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

## 5. 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 分别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金融危机。前者始于泰国, 继而席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韩国以至日本, 猛烈冲击了香港、台湾地区, 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后者则起因于美国的严重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华尔街风暴,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 严重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面对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党中央本着负责、务实和审慎的态度, 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由于中国提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防范金融风险, 加之本身实行的是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 使得我们在两次重大金融危机中都未受到直接冲击, 经济金融和社会秩序继续保持稳定。

## 二、中国共产党化解重大涉外事件的历史经验

面对各种重大涉外事件的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 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环境条件出发, 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应对和处理, 在化解重大涉外事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丰富而又宝贵的历史经验。

### 1. 审时度势, 沉着反应

重大涉外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处理得好, 事件不但能得到妥善解决, 甚至可以转危为机、化干戈为玉帛; 反之处理不好, 则易于激化事态, 使矛盾升级, 造成更严重的国际影响。因此, 快速准确地判断形势、沉着冷静地加以应对是化解重大涉外事件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 党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便是审时度势、沉着反应。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红旗落地后, 许多人惊慌失措、举棋不定, 在异常严峻的历史关头, 中共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不仅成功地应对了外来冲击, 力保红旗不倒, 而且中国社会主义越搞越好, “风景这边独好”。再如 1999 年“炸馆事件”发生后, 党更是表现出了非凡的清醒和理智: 一方面充分理解和尊重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 给“玩火”者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慑; 另一方面, 又坚持依法进行抗议活动, 防止过激行为, 严格地把盲目排外打砸抢烧与反对北约侵略的行径区别开来, 把北约内部以美国为首的死硬分子与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国家区别开来, 从而在这场斗争中赢得了主动权。

### 2. 总揽全局, 统筹各方

涉外事件的发生关涉不同的国家利益主体, 具有

很强的敏感性和连带性。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形势下,需要决策者总揽全局、统筹兼顾,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中共几十年来应对重大涉外事件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处理“炸馆事件”时,党中央一方面对民众组织的自发爱国行动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坚决支持一切合法的抗议活动,通过国内外舆论深刻揭露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另一方面及时教育广大民众把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义愤转化成奋发图强、努力进取的精神力量,强化了全国人民“自强才有自尊、兵强才能国安、家和才能万事兴”的共识,从而将爱国主义的精神和民族自尊的情感升华至更高境界。在处理中美撞机事件时,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向美方一再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坚持要求美方承担全部责任并道歉;另一方面,中国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在两次涉外事件的处理中,党和政府还积极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正是凭借这种总揽全局、统筹各方的策略方针,党不仅维护和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而且充分保障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

### 3. 独立自主,利益至上

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可靠保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从根本上讲,捍卫国家的主权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涉外事件的处理中,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利益至上”的原则,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地位不动摇。这也成为党一次次成功化解涉外危机的又一条宝贵经验。邓小平曾经讲道:“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sup>[5]</sup>在朝鲜战争中,一方面,中国选择出兵的战争对手是当时世界上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美国,但为了保障领土安全,党和国家没有屈服于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军事威胁;另一方面,中国选择出兵朝鲜与否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取决于哪种决策能带来最大化的国家利益,经过反复讨论、周密分析和权衡利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最终认为出兵参战更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不出兵参战则利益损害极大,因此才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炸馆事件”中,党和国家依然不畏强势,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承担全部责任,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表现出了莫大的决心、勇气和信心;在“炸馆事件”的后期处理中,在美方基本满足前三项要求的情况下,党中央能够着眼于尽快恢复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利益,不作纠缠而适时解脱,充分显示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处理原则。

### 4. 依靠人民,广泛动员

在历次重大涉外事件的处理中,依靠人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党成功化解一次次涉外事件的重要法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兵民是战争胜利之本”思想的指导下,通过科学充足的战争动员,把蕴含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强大的战争潜力快速、持续而又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战斗力,使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综合国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获得了战争胜利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精神力量和社会基础。日本靖国神社事件发生后,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报道了中曾根参拜的新闻;新华社也发表《绝不允许混淆侵略战争的性质》,批评日本政府混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指出中曾根的行为大大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遭受过日本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激烈地批评了中曾根政权,邓小平也不点名地警告了中曾根,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让人担心,要注意日本政界,特别是个人的所作所为”<sup>[6]</sup>。主流媒体和党中央的表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骨干力量的声讨参拜靖国神社浪潮,这给日本右翼势力以极大威慑力的同时,有利于敦促日本政府更好地正视历史、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 三、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涉外事件的历史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党不断应对和化解一次又一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历史。在诸多重大突发性事件中,重大涉外事件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处理重大涉外事件的长期征程中党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供后人借鉴,也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历史启迪令后人思索。

#### 1. 要学会“刚柔并济”

学会“刚柔并济”,最根本的是学会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之间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成功处理重大涉外事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处理“炸馆事件”以及中美撞机事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斗智斗勇:一方面依据“有理”原则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承认错误并道歉;另一方面依据“有利、有节”的原则,始终强调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取得了某种外交成果后便开始降低姿态,让风波逐渐平息下来。这样做既照顾到了群情激昂的民族利益,又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利益;既考虑到短期的眼前利益,又着眼于长期的整体利益;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保持了适度克制,最终保证了这两次事件的成功处理。

#### 2. 要学会“智勇双全”

学会“智勇双全”，最根本的是学会将足智多谋的策略与当断必断的勇气相结合。重大涉外事件的发生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复杂局势的应急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党在面对紧急状况时的应变能力。尤其是在应对充满激烈对抗的重大涉外事件时，由于涉及纷繁错综的利益关系，因此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具备非凡的智慧；与此同时，由于矛盾双方博弈关系和冲突局面的存在，因此在解决的过程中又必须要有果决的勇气和胆魄。在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关系破裂这两次重大涉外事件中，初掌执政大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惧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超级大国，面对美国 and 苏联先后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表现出超常的勇气和胆魄来应对挑战，这也成为新中国在冷战时期两极争霸的夹缝中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勇”字当头并不意味着莽撞和冲动，而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以及灵活多变的智慧策略之上，诸如在朝鲜战场陷入僵局时适时开启和谈、与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得以从朝鲜战场全身而退，以及中苏断交后奉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政策，并与美日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避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境地，凡此种种都充分体现了党“有勇有谋”的一面。

3. 既要善于引导民族情绪，更要善于控制民族情绪

大凡重大涉外事件往往都具有民族性特征，尤其是具有一定对抗性的涉外事件发生后，往往能够激起全体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乃至民族主义精神。近代中国连遭西方列强侵略，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亡国危险，中华民族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展开了大规模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由此诞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近代民族主义的目标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上升，百年屈辱带来的压抑感有了释放机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然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反应得当可以发挥凝聚整合功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反应过激则会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或倒退。近年来，在全球化和外部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机会不断增多，“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日本靖国神社和教科书事件等突发性事件触动了国人“受害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对待因重大涉外事件引发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时，既要懂得爱护群众的爱国热情，也要学会科学引导群众的爱国热情，还要防止有人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

4. 既要善于“化险为夷”，更要善于“转危为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说祸与福之

间既对立又统一，是一对辩证的矛盾体，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同样的道理，重大涉外事件只要应对得当、处理妥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要善于把事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且还要善于把危难看成转机，进而把不利局面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即要学会利用危机，发掘危机的正能量，善于在危机中总结、学习和进步。在应对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成功地应对了外来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而且适时利用危机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展现出良好大国风范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党和政府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同时出台一系列举措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保持金融稳定，不仅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此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国际环境，努力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参与者和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者，让国际社会再一次认识到中国价值的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温家宝总理更是抓住时机，于 2009 年伊始展开了以“信心”为主题的欧洲之行，频繁出访西欧诸国为中国积攒了更多的资本和力量，使得中国能够在以后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占据更多主动权。可以说，金融危机在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无疑也为中国拓宽了一定的外交空间，提供了与西方展开制度竞争乃至价值竞争的机会。

参考文献：

- [1] 唐明勇，高岳仑. 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 理论探讨，2005，(4).
- [2] 孙晓晖. 从“三件大事”看中国共产党处理重大危机的经验与启示[J]. 理论探讨，2012，(3).
- [3] 谢春涛. 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纪实[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269—274.
- [4] 1985 年：中曾根首相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EB/OL].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932/8933/20020909/818217.html>, 2002-09-09/2012-10-13.
-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4.
- [6] 林思云. 日本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追溯[J]. 中国报道周刊，2003-04-30.

〔责任编辑：刘建明，王华薇〕